

2019，痛别32位院士

留声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4天，痛失3位院士！》《8月，痛失6位院士》《5天内痛失2位重量级院士》……2019年，每一次看到这样的讣闻，都令国人深感痛惜。前不久，人民日报微博做了一次梳理，发现截至12月中旬，我们竟已送别32位院士。

从年初的“材料院士”涂铭旌、“两弹一星”元勋于敏、著名物理学家梁敬魁，到下半年的我国小儿血液病学科创始人胡亚美、自动控制专家张嗣瀛，再到上周刚刚离去的“风云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孟执中、著名病毒学家田波……一个个功勋卓著的名字，接连出现在讣闻里。

无论中外，科学家总体上比较低调，远离聚光灯确乎也是科学工作的常态。不少院士的成就

人意识到，如果不能自主掌握核心科技，随时都会有“被卡脖子”的风险，甚至受制于人；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用创新托举中国梦，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科学家，赓续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接力奋斗，让人力大国成为人才强国，让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

2019，他们的离去让人不舍。但我们也清醒地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关键是在缅怀中，崇敬科学家、热爱科学要成为一种潮流；在缅怀中，国民的科学素养要稳步提升。

我们希望，故去科学家的故事永久流传，他们的名字长久被传颂。这些科学家，让人不舍，更催人奋进。我们乐见，袁隆平、屠呦呦等科学家正在成为“超级偶像”。江山代有才人出，新时代，一定会涌现更多“领风骚”的科学家。

留声

要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因为，科技发展是一场接力赛，要靠一代代人的努力。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我觉得个人名利事小，把这个接力棒交好，尽快提高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才是大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李济生，7月28日去世，享年76岁

科学的成就，来自于千万科学工作者的默默耕耘。然而，由此建成的科学大厦却如此辉煌。每念及此，心旷神怡，身为科学一兵，其乐融融。

——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查全性，8月1日去世，享年95岁

搞科研就是要发挥创造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卓仁禧，8月6日去世，享年89岁

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8月12日去世，享年89岁

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工业品倾销，就立志要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我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化学工程专家陈家镛，8月26日去世，享年97岁

科学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章综，8月27日去世，享年90岁

五十年来我目睹了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力逐渐鼎盛的发展过程，远超过我青少年时代梦寐以求的对振兴民族的期盼。

——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学家王补宣，8月31日去世，享年98岁

看到我国纺织化纤工业的发展，我的辛苦实在不算了什么。

——中国工程院院士、化学纤维工程技术和管理专家季国标，9月5日去世，享年87岁

大自然就像一把磨刀石，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很自豪我所从事的职业，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选择地质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地震学家李坪，9月10日去世，享年96岁

年轻人要挤时间，不要把时间浪费到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要树立严谨的学风，不能浮躁。

——中国工程院院士、泥沙与河床演变专家韩其为，10月1日去世，享年86岁

当医生多好！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当医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儿科血液学家胡亚美，10月3日去世，享年95岁

爱迪生有句名言“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而我的那1%的灵感也来自99%的汗水。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自动控制专家张嗣瀛，10月4日去世，享年94岁

做事情要one thing at a time(一心一意)，在一个时间里只专心做好一件事，肯定能做得比较出色，同时去想几件事，反而哪件事也干不好。

——中国科学院院士、固体地球物理学家曾融生，10月22日去世，享年95岁

能够在短短的人生中，以科学服务人类，这就是我此生不懈追求。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献身科研，成为服务国家科研发展的脊梁。

——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陈星弼，12月4日去世，享年89岁

判断一个科学家的成果，不能只看他发表论文的数量，关键要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科学研究要与实践相结合。

——中国科学院院士、病理生理学家陆士新，12月6日去世，享年90岁

航天人也有失利，但绝不屈服。

——中国工程院院士、气象卫星专家孟执中，12月14日去世，享年84岁

根据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兴趣的问题立项研究，做出创新性结果的可能性远大于根据计划和指南申请的课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病毒学家田波，12月15日去世，享年88岁



第一排：涂铭旌、于敏、梁敬魁、金国章、高长青、王业宁、孙伟；
第二排：阮雪榆、沈自尹、容柏生、李恒德、宁滨、孔祥复、孙忠良；
第三排：汤定元、李济生、查全性、卢永根、陈家镛、章综、王补宣；
第四排：卓仁禧、李坪、季国标、韩其为、曾融生、胡亚美、张嗣瀛；
第五排：孟执中、田波、陈星弼、陆士新。

本报记者王京雪

2019年逝世的科学家似乎格外多，也格外受人关注。

截至12月中旬，这一年，我们已相继送别32位两院院士——这也是2018年逝世的院士总数。此外，还有数位在所属领域居功至伟的科学家也于今年离世。

在贯穿全年的相关媒体报道后面，总能看到人们自发留下的大量缅怀话语。

有人饱含歉意与敬意，“对不起，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虽然对很多科学家都不太了解，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国家的贡献。”

有人希望媒体多宣传科学家，“不要等人家去世了，才知道他的姓名”。“多讲讲他们的事迹，他们是怎样的人？做过怎样的事，说过怎样的话？为什么值得怀念？他们的离开又意味着什么？”

有人感叹：“这才是国家的真明星、真偶像！”“这应该是点击过亿的人，粉丝无数的人，被铭记的人！”

毫无疑问，在新中国70年奋斗史中，在科技强国道上，这些谢幕转身的科学家们刻下了自己的姓名，印上了自己的足迹，而人们往往并不确切知晓他们的贡献——“大国明星”们习惯将名字深埋于泥土，却联手塑造了你我今日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了解这些不够“出名”的著名科学家。人们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做过怎样的事，说过怎样的话？为什么值得怀念？他们的离开又意味着什么？

爱国者

翻开2019年离世科学家的名单，可以看到，他们绝大多数成长于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怀揣科教报国的心愿，付出毕生心血建设新中国，爱国者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这代科学家人身上有共性，即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用1月16日逝世的“两弹一星”元

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核物理学家于敏的诗句，就是“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在中国，于敏的名字曾绝密了28年。在“隐身”岁月里，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和武器化。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于敏多次否认中国“氢弹之父”的称谓，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于敏喜欢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认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非常好的品德。

10月4日，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张嗣瀛逝世。35年前，在1984年的国庆阅兵仪式上，年届六旬的他对着受阅方队中的我军新一代单兵反坦克武器热泪盈眶——为解决该武器因控制指令交叉耦合而不能中靶的问题，他研究了3年。

张嗣瀛曾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国防我们强大起来，经济我们全面上去。现在看到中国发展了，我非常高兴，但是还不行，还要干，还希望中国再强大。”

国家情怀也体现在科学家们做出的人生抉择中。

物理学家、半导体学科创始人之一、红外学科奠基人汤定元，是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之一，曾为“两弹一星”等研制作出重要贡献。

1951年，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的汤定元怀着报国热情回到祖国。后来，他多次被人问起选择回国时的所思所想，他说他不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这种问题这么感兴趣，在他看来，回国是理所当然的事，简直不值一提。

1956年，化学工程专家、我国湿法冶金学科奠基人陈家镛放弃在美国的事业，回国工作。他针对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急需，开拓了湿法冶金新工艺和新流程，使我国湿法冶金在很多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陈家镛曾说：“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工业品倾销，就立志要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我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实

践自己的诺言。”

同样出于科学报国的信念，材料学家涂铭旌在1958年登上从上海西行的列车，响应国家号召，举家西迁，前往建设中的西安交通大学，投身金属材料学建设。

今天，他参与创建的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以研究材料力学行为基本规律、特异现象和材料服役效能为主的科研机构之一。

奉献者

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与栋梁，从来不像其外表那般享有夺目光彩。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奉献者是这些科学家们身上的另一个标签。

今年6月，我国毫米波技术领域杰出专家和教育家孙忠良逝世。在身边人眼中，这位曾担任国防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总装科技委兼职委员、总装某专家组专家的老人，看上去像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傅”。他们知道他干的是“大事”，但不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

孙忠良为我国毫米波技术的工程应用和国防应用作出杰出贡献，其研究对推广5G技术具有重要意义。直到生命最后阶段，这位常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老先生，还在病床上与同事约定出院后一起建造价格更低廉、创新性更强的毫米波超材料成像系统。

8月，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布衣院士”卢永根逝世。

为实现“人人有饭吃”的理想，他为我国水稻遗传研究作出杰出贡献。在他70多岁时，还带着学生翻山越岭，寻找野生稻种。

87岁，一生节俭的他和老伴一起将毕生积蓄880万元捐出，成立教育基金。他说，支援国家搞现代化，不把教育搞起来，是不可能的。“我要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作为最后的贡献。”

89岁，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科研和教育事业。

(下转15版)